

楔子

……正是午夜時分，歷史剛剛進入1948年。北京大學教授、詩人馮至突然從夢中醒來，在萬籟俱寂中，聽到鄰近有人在咳嗽，咳嗽的聲音時而激烈，時而緩和，直到天色朦朧發亮了，才漸漸平息下去。馮至卻怎麼也睡不着了，他想：這聲音在冬夜裏也許到處都是吧。只是人們都在睡眠，注意不到罷了。但是，人們不正是可以從這聲音裏「感到一個生存者是怎樣孤寂地在貧寒的冬夜裏掙扎」嗎？——詩人想了很多，很久。幾天以後，一篇題為〈新年致辭〉的文章發表在天津《大公報》「星期文藝」副刊上。在講述了那在天色暗明之間的生命感悟之後，詩人接着寫道——

如今又是一年的開始，由於過去的教訓，大半沒有人敢對於今年抱多大的希望了，大家都是憂心忡忡地過日子。就以出版界而論，由於紙價的騰貴，讀者購買力的退減，作家生活的艱難，今年的文藝界恐怕將要比過去更加荒涼。人們都這樣談論，這樣擔心；但既然這樣議論，這樣擔心，就證明人們並不想就此死去，他們還要繼續掙扎，縱使是在所有外界條件都被剝奪了的時刻。——若是把一個小小的文藝副刊比作冬夜裏咳嗽的聲音，未免太不倫不類，但就一個生存者的掙扎這一點來看，則又有類似的地方。現在什麼不是在掙扎呢，從一日的溫飽，到最崇高的理想，凡是在這一條線索上能夠連串起來的事物，它們都在掙扎。只有那些用千萬人的生命來滿足人的妄想的人們不懂得生命的掙扎，他們在踐踏生命。

並且現在是沒有餘裕來修飾自己的時代。人類的痛苦正如冬日的樹木，直挺挺地在風中雪中搖擺，沒有一點遮蔽。只有罪惡會穿



葉聖陶(1894－1988)，原名葉紹鈞，字秉臣，筆名有葉陶、聖陶、桂山等，是中國現代著名作家、教育家，曾任商務印書館、開明書店編輯。他是五四運動首個文學研究會的創立人之一，座右銘為「文學為人生」，終身致力於出版及語文的教學。

上一件美麗的外衣，在人面前眩惑一時；大多數的騙子都會用空洞的口號蒙着自己的虛偽。但是一個真實的生存者是不懂得這些手法的。縱使他的聲音像是半夜的咳嗽那樣不悅耳，但是它使聽到它的人感動了，有所領悟了，因為它是生存的聲音。

但願這個刊物能夠繼續下去，和一切生存者息息相關，沒有修飾，沒有浮誇，自然也願意在自己的生命裏開出一些美好的花朵。

詩人是敏銳的，他說出了這個時代的真實：「生存」成為壓倒一切的需要，於是有了生存者的掙扎與選擇，有了生存者的文學。

元旦這一天，儘管處於戰亂之中，人們照舊過着自己的日子。作家葉聖陶在忙碌了一天以後，按照多年形成的習慣，在燈下，記下了這一天的生活——

1日（星期四） 看報。校對十餘面，頭又昏脹，形寒，因偃臥。下午一時半出外，步行至青年會，行一小時有餘，體內覺溫暖，精神亦較爽。

到青年會因朱學蓮與殷小姐訂婚，朱之父蘊若先生，係用直學校之同事，別將二十年矣，今來上海，自宜往一語。見時知其老而不衰，雙目失明四年，近入醫院，一目已重明。所患曰白內障，破眼球膜，剝去內障，居然無恙。三時半進茶點，伯祥與余及馮賓符三人致辭。到者約七十人，十之六七係用直人。伯祥與余離用直時，此輩或方為嬰孩，或且未出生也。六時回家。¹

在平實的日常生活中透出了歷史的滄桑之感，這心境也是屬於這時代的大多數人。

性格比葉聖陶遠為峻急，因此而成為1948年最有爭議的作家的胡風，這一天也過得很平靜。他在自己家裏，接待了來自南京的三位年輕朋友：路翎、化鐵和阿壘，暢談三日之後即一道校改《財主底兒女們》下部紙型上的錯字，一天基本校完，又忙着為尋購印書的紙張而四處奔波²。胡風早已預言：「時間將會證明，《財主底兒女們》底出版是中國新文學史上一個重大的事件。」³此刻的胡風卻是滿頭大汗，一臉嚴肅：在做這些出版瑣事時，他是懷着一種文學莊嚴感，以至悲壯感的。

在北方故都北平，清華校園內這一日卻有一番熱鬧：上午全校師生在工字廳舉行新年團拜，晚上中文系師生舉行同樂會。晚會的最高潮，是系主任朱自清先生和同學一起扭秧歌。其時「翻身秧歌」已在北方廣大農村跳得如火如荼，現在又傳入了學術殿堂清華園；而素以穩健著稱的朱自清先生這回卻聽任學生給他化裝，穿紅衣，戴紅花，儘管有幾分不自然（由於不習慣），卻又是極其認真地投入群眾娛樂的熱潮中：許多人事後都覺得這件事頗有一種象徵意義。而朱先生本人卻在日記中鄭重寫道：「參加中文系新年晚會，深有感慨。」⁴

女作家丁玲在本世紀曾兩度成為人們注目的中心：1928年，二十四歲的她以《莎菲女士的日記》對人生（與性）的大膽、潑辣的追求而震動文壇；二十年後又以反映農村階級鬥爭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而成為知識分子與工農結合的成功典型。她是在河北石家莊市郊宋莊迎來1948年的。在此之前，她在給親人的信中，已經談到了她「對宋莊有了感情」——

陳明，我從昨天病了，現在還躺在牀上，又是那麼可厭的感冒，現在已經退熱了，準備下午起牀。我為什麼病的呢？一半是由於前天驟冷，一半是由於感情把我壓倒了。我要告訴你，我對宋莊

有了感情，我在大前天晚上的代表會上，哭了。我說了我對於那些貧苦者，有了被子，有了襖，有了甕，我的高興。我說了我對於那些不滿意得了綠票的同情。……我說了我對於滿圈的同情，當我走進他的屋子裏的時候，我只在地炕上找到一張破牀和一牀破被，一口破箱子裏有幾件小孩衣服，我才明白，為什麼他在貧農團蓋着沒收來的地主被子時，是那樣地在炕上爬來爬去，可他連一張紙也沒往家拿呀！當評級評到他家時，他堅決而迅速地說：「三等貧」……

這感情自然是真誠的，儘管不免帶有文人的誇張：知識分子來到民間、農民中，總會有這樣的驚喜，感動，以至內疚。這位滿圈的形象一直深藏在丁玲記憶裏，直到歷經風風雨雨，晚年重寫《嚴寒的日子裏》時，仍以滿圈作為小說主人公的原型。丁玲當年在宋莊的活動也變成了英雄傳奇，至今仍在當地流傳：在一個漆黑的深夜裏，篡奪了貧民團權力的壞人，煽動群眾，武裝包圍了村公所；老蔣同志（丁玲在宋莊用的是「蔣英」的名字）面對上了膛的刺刀，面不改色，侃侃而談，最後說服了大多數人，紛紛放下了槍，區武裝部隊也及時趕來，終於化險為夷……⁵

與丁玲同是延安文藝界的大名人的蕭軍此時在東北解放區。作為《文化報》的主編，1948年元旦這一天他向讀者送上了〈新年獻詞〉，署名卻是「秀才」：原來他要標新立異，借一位曾對新政權有過誤解的老秀才的口吻，表達一般老百姓以及舊式知識分子對革命者和共產黨人的新認識和真誠擁護：「從此『正統』之迷夢，同情地主『慈悲心』粉然碎矣！始知革命者與共產黨人之所為，斯其乃以聖人之心為心，以聖人之懷為懷，聖人之志為志，順乎天理，應乎人情，互古所未有……」⁶ 蕭軍在這裏傳達了一個重要的時代信息：當年共產黨人與革命者正是以類似「聖人」的道德的純潔性而贏得人心的；當然也可以說這實際上是一種

主觀的期待（因而不免是一廂情願的），但誰也不能否認這乃是那個時代善良的人們的由衷之言……

和丁玲一樣在大變革的北方農村和農民一起迎接新的一年的，還有趙樹理。在1947年7、8月召開的晉冀魯豫邊區文聯文藝座談會上正式確認「趙樹理的創作精神及其成果，實質為邊區文藝工作者實踐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具體方向」，趙樹理成了解放區文藝的一面旗幟。但老趙依舊是老趙，他仍作為一個普通的編輯，積極投入了《新大眾報》1948年元旦創刊的工作。編輯部設在河北趙莊，他家也搬在那裏；有人這樣描寫他的「辦公室」：「裏外兩間，外間老鄉放着些雜物，鍋，盆，爐子，席囤，農具，等等，後牆塌了一個角，露面進來一條太陽光；裏間有一張單桌，也放着老鄉的罇罇罐罐之類；他的地盤仍舊在炕上，盤着膝坐在那裏寫，窗口放着的，還是那幾樣東西……那周圍的樣子，幾乎和在太行山小山莊上的情形沒有什麼不同。」⁷1947年1月，趙樹理與美國記者貝爾登有過一次有趣的對話：「你這些作品的版權是誰的？收入有多大？要是我們美國，你出了這麼多的書，一定是一個很富有的人了。」趙樹理回答說：「這是我的工作崗位，這是我應該做的工作。我們是不談稿費的。」「這不是剝削了你嗎？」「這怎麼能算剝削呢？寫作是我的具體分工。我是以此作刀槍同敵人，同反動派，同舊的風俗習慣作戰鬥的，我是一個文藝戰士。」在談話裏，趙樹理還強調了他是「為農民寫作」的——正是這一寫作的基本立足點，很快就給趙樹理帶來了麻煩⁸。

和趙樹理同樣自稱作「文藝戰士」的，還有一大批活躍在戰場前線的文工團員。也就在1948年元旦這一天，新安旅行團的演員在朝城岳樓屯華東野戰軍司令部駐地的土台子上演出。1947年因孟良崗等戰役的勝利而威震全國的陳毅、粟裕將軍在台下和戰士一起觀看。先演秧歌劇《夫妻識字》、《光榮燈》，歌劇《張德寶歸隊》，活報劇《美蔣活報》；

接着，改變場面，在舞台前廣場演出《勝利腰鼓》。幾十把火炬，照得廣場通明。新旅男女演員頭扎白頭巾，腰繫紅綢，在嘹亮的《解放軍進行曲》軍樂聲中，打起腰鼓，分作兩隊從兩邊威武雄壯地走上廣場。近萬觀眾鴉雀無聲，只聽得隆隆的鼓聲和「向前，向前」的軍樂呼喚。忽然場上一聲號令，響起了驚天動地的鼓聲、軍號聲，隨着隊形變換，有如千軍萬馬，前奔後突，蔚為壯觀。鼓聲一停，陳毅、粟裕一起上來，連聲讚好，陳毅激動地揮舞着手說：「你們的腰鼓打了解放軍的威風，要把它打到華東野戰軍所有的部隊去，打遍全中國！」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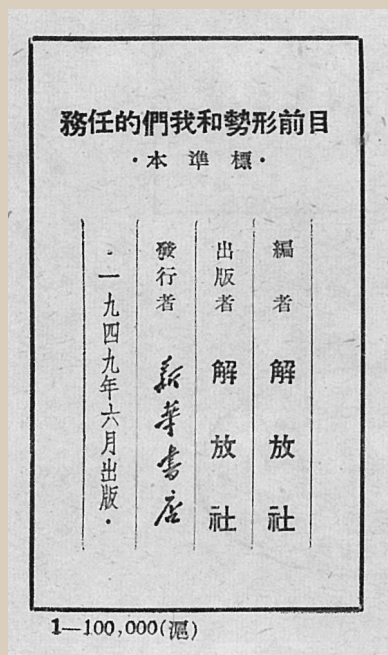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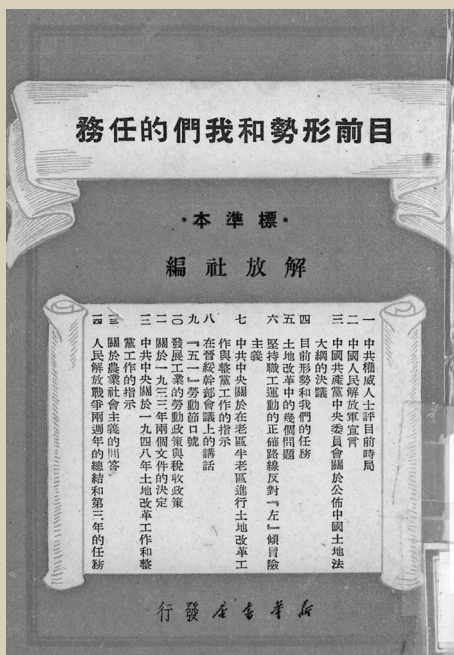
和北方清華大學的同樂會遙相呼應，元旦這一天，香港文協舉辦了新年團聚大會。從1947年末開始，在中共的安排下，各界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紛紛從國統區各大城市和海外彙集到香港，據茅盾說，人數總在千數以上，「隨便參加什麼集會，都能見到許多熟悉的面孔。大家都興高采烈，沒有一點『流亡客』的愁容和淒切」，與1941年皖南事變後，大批傾向共產黨的文化人轉移香港，情況與心境都大不相同。這次新年團聚會到會的有三百多人，可謂一次「大會師」。郭沫若、柳亞子、翦伯贊、茅盾、葉以群、適夷、林林都講了話。茅盾後來回憶說，他講話的中心是，「建議香港文藝界應該加強文藝批評工作，糾正前一時期主要存在於上海的文藝批評的偏向。這種偏向表現在對正面的敵人不批評，好像有危險，而對自己陣營卻有一些不負責任的批評。這些批評調子唱得非常高，非常『火』，使青年以為這是最革命的。但實際上它是要引導青年到錯誤的方向」¹⁰。茅盾這裏所指主要是與胡風有聯繫的一些青年批評家的批評活動，我們在下文還會作詳細介紹。儘管目前還是發動反擊的建議（向誰建議自是很清楚的），但敏感的人們已經可以嗅到些許火藥味了。這似乎在預告，剛剛降臨於世的1948年的中國文壇將不會平靜：這也是一個「戰場」。

註釋

- 1 《葉聖陶集》，第21卷，248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
- 2 《胡風回憶錄》，40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
- 3 胡風：〈青春底詩〉，見《胡風評論集》（下），9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
- 4 《朱自清全集》，第10卷，487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
- 5 見宗誠：《風雨人生：丁玲傳》，222、223-224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
- 6 〈新年獻詞〉，載1948年1月1日《文化報》（哈爾濱）。
- 7 楊俊：〈我所看到的趙樹理〉，見《趙樹理研究資料》，27頁，北岳文藝出版社，1985。
- 8 見董大中：《趙樹理評傳》，186頁，百花文藝出版社，1986。
- 9 大朋：〈「新旅」在解放戰爭中前進〉，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史料選編（解放戰爭時期）》（上），277-278頁，解放軍出版社，1989。
- 10 茅盾：〈訪問蘇聯•迎接新中國——回憶錄（三十三）〉，載《新文學史料》1986年第4期。

一、面對轉折——1948年1、2月

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衝擊
波——《人民日報》傳出的信息——蔣介石的
元旦訓詞——《文藝先鋒》宣布的官方文化
政策——《大公報》和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
的信仰



解放社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封面及內頁，1949年6月出版，收錄了1947年5月至1948年7月關於中國共產黨政策的14個重要文件